

“民国时期的中法文学交往”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杨 振

2016年5月30至31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法文系和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民国时期的中法文学交往”国际研讨会。来自法国、日本和中国的十几名学者相聚复旦，围绕民国时期中法文学交流进行了为期两天卓有成效的研讨。

会议源起于组织者如下思考：民国时期大量法国文学作品被译介成中文，这一时期的中国经验也影响了一些法国文学家，这两种现象均促成了许多值得研究的跨文化交流个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具有法文和法国文学教育背景的学者，开始关注民国中法文学关系，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专门以民国中法文学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尚不多见。如果能够将相关学者聚集到一起，为他们提供展示各自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的平台，无疑可以进一步揭示民国中法文学交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帮助学界了解民国中法文学交流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趋向。

此次与会者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法国文学被引入民国文学语境后如何以及为何发生改变。其中有对戏剧文本改编的研究（马晓冬：“革命与爱情：萨尔都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改编（1909-1946）”；罗活：“西哈诺的幻灭——现代中国一部浪漫剧的翻译改编研究”；徐欢颜：“顾仲彝对法语戏剧的转译与改编——以《生财有道》为中心”）；有对传统译本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袁莉：“民国三李同译‘包法利’——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国文学在民国文学期刊中的译介”（项目号：15CWW008）的部分成果。

李劫人、李青崖、李健吾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还有对罕见译本——译文校注本的研究(邹振环:“伍光建译《侠隐记》与茅盾的校注本——兼谈西学译本校注之副文本”)。会议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法国文学译介如何促成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段怀清:“活法国的姿态:清末民初文学文本中的法国形象”;欧嘉丽:“翻译与创作的边缘:戴望舒诗歌中的法语诗意象”;韩一字:“周作人与法国文学”),如何帮助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杨振:“病态与颓废的诗人:民国时期(1917-1937)波德莱尔批评的一种趋向探源与反思”),如何推动确立中国现代文类的经典地位(Véronique Bui:“傅译以前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现代小说与批评”)。一些较少为前人注意的法国文学译介载体和媒介对汉译法国文学形态的影响也受到关注(雷强:“《法文研究》(1939-1943)评介”;王建开:“英译本——法国文学在现代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法国哲学思想在民国的译介(志野好伸:“翻译柏格森:在中国和在日本”),以及民国游历和民国思想对于法国文学和哲学产生的影响(Emmanuel Lincot:“民国法国文学外交成果的继承人:吕西安·博达尔”;合田正人:“面临虚空的眩晕 一面沉默的 一面喧闹的:梅洛-庞蒂对克洛岱尔和马尔罗的读解”)。

整理会议取得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在反思:民国中法文学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民国文学史是一段充满转型和变化的历史。许多对中国文学转型和变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新观念之引入,并非法国文学译介者一家之功。若将研究起点和落点始终局限在两种国别文学关系中,则有可能限制思考格局,甚至会让我们失去观察和评价历史大势的合适视角。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每一个中法文学交流个案,都与当时的历史情境息息相关。有些个案还较为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与传统对话和博弈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将中法文学交流个案始终置于历史发展趋势的框架下去观照,也许能够避免个案研究所可能具有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

也为我们以切实的证据突破已有历史论述框架提供可能。

民国中法文学交流研究不仅隶属于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叙事，同时也必然包括对中法文学个体心灵对话的研究。每一个法国文学文本背后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故事，都承载着作者的心灵对世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感悟。民国的文学文本亦然。揭示法国文学家及其中国阐释者各自的精神深度，是民国中法文学关系研究应有的题中之意。此次会中，已有相当一批与会者从文本发生学角度，对相关中法文本进行了细致比对。我们有理由期待日后读到更多揭示中法文学灵魂深度交流的作品，为我们正确评价法国文学在民国被接受的角度和程度提供参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是封建帝国教育和现代共和国教育的交接点。“五四”时期萌芽发展的自由、平等和尊重个体的观念，冲击着古老的伦理道德，也一再遭遇各种话语和建制的压抑。但这并不妨碍自由、平等和尊重个体的观念始终激动着相当一部分法国文学译介者的心灵，让这一时期的中法文学对话充满了为现代公民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人性之力。这份力量，也是此次会议学术价值之外的现实意义所在。